書介與短評

展示革命聖地的日常生活史

● 王 鋒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 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長期以來,延安作為中國革命 聖地,一直存在於歷史敍述之中。 「聖化」敍事賦予延安神性的同時, 卻使延安脱離了日常生活,脱離了 活生生的歷史。朱鴻召的《延安: 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一書 (以下簡稱《延安》,引用只註頁 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不 足。作者通過大量查閱文獻檔案和 訪問革命老人,對延安時期的物質 生活、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進行了 描繪,展示了延安這個革命聖地的 日常生活史。

眾所周知,目前的延安研究, 對政治、軍事等方面關注較多,而 對日常生活關注較少。朱鴻召在接 受《中國青年報》記者的採訪時曾 表示:

我們這兩代人所接受的一般社會歷史理論,往往只關注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經濟運行規律等宏大歷史問題,也習慣於對歷史進行宏大敍事的理解。實際上,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內在文化圖式,直接塑造了自在自發的活動主體,從血脈和骨子裏影響並制約着特定時代的個體行為方式和社會運行的價值取向。(〈《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回憶延安式的浪漫〉,《中國青年報》,2007年9月10日。)

因此,在考察延安社會時,朱鴻召 選取了日常生活的視角。

延安的歷史,是一部人的改造 史,暴風驟雨如整風審幹,和風細 雨如民主生活會。關於整風和審幹 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朱鴻召已在

144 讀書: 評論與思考

2001年出版的《延安文人》中做了詳細的考察。《延安》一書則主要考察了改造人的主題怎樣在延安的日常生活中呈現出來。

本書中的〈改造「二流子|〉一文 詳細考察了中共改造二流子的原 因、具體步驟及其成果。作者認 為,改造二流子不僅推動了大生產 運動的順利開展,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提供了通過農業勞動來改造人、 重新塑造人的經驗。運動的步驟如 下:第一步,邊區政府將它作為一 項政治任務下達各鄉村,各鄉村按 照上級指示和報紙提供的經驗,按 圖索驥,對號入座,劃定二流子的 名單;第二步,召開群眾大會,領 導講話動員,群眾發言揭發,二流 子表態宣布改過自新,並尋出擔保 人,訂出生產計劃;第三步,對於 宣誓願意改過的二流子,由政府安 排、分配或聯繫租借一定的土地、 種子和農具,扶助監督他們參加農 業生產或其他勞動; 第四步, 對一 般宣傳教育和幫助監督改變不了的 二流子,採取大會訓斥、當眾恥辱 和強制改造;第五步,對頑固不化 的二流子,則採取集中管制、強迫 勞動的方法。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 動,無不沿襲了這一模式。

人的改造在新秧歌運動中也有 所體現。在陝北,秧歌本是一種祀 神的民俗活動。鬧秧歌主要是為了 報答神靈,祈求神靈保佑歲歲平 安,五穀豐登。鬧秧歌不僅「娛 神」,而且「娛己」,可以説是農民 的一種狂歡活動。1943至1944年, 延安興起了新秧歌運動,藝術家們 對傳統的秧歌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改造後的秧歌,僅保存了其形式, 而在內容、角色編排等方面皆做了 重大調整,「變成了解放了的、而且開始集體化了的新的農民的藝術」 (周揚:〈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看了春節秧歌以後〉,《解放日報》, 1944年3月21日,第4版)。

换言之,新秧歌已經不再是具有濃厚民間氣息的藝術形式,而變成了一種革命化、意識形態化了的秧歌。它的娛樂功能更多地轉化為政治意識教育功能。對秧歌的改造,除了看到這是對民間形式的一種革命化改造以外,還應當看到,藝術家的創作思想、藝術觀念都發生了重大影響。而秧歌的表演者——在當時,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搶救者」——在扭秧歌時也於無形中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禮」,從而逐漸轉變思想,最後達到思想統一。

日常生活是繁雜瑣碎的,其中 的細節,在以往的歷史敍事中往往 被省略掉,入不了「大歷史」的法 眼。但是,歷史的真實卻往往隱藏 在這些細節之中。當我們試圖還原 歷史的時候,就必須重新審視這些 散落於日常生活中的細節。尤其是 在「大歷史」被某種意識形態所左 右、可以任意篡改的時候,這些細 節卻因為其繁雜瑣碎和不易被注意 而難以或者無力去扭曲篡改。從這 個意義上來講,這部延安的日常生 活史倒是給我們呈現了一個「陌生」 的延安——一個與我們所耳熟能詳 的「聖地延安」所不同的「生活化」的 延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填 補了延安研究的一個空白。

《延安》一書中有着大量頗有 意味的歷史細節,這裏僅以對「延 河水」的描寫為例略作説明。對於

通過新秧歌運動對秧歌的改造,使藝術家的創作思想、藝術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一轉變對以後的文藝乃至文學創作方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延河水」,一貫的説法是「玉液瓊 漿之水」,「流着牛奶與蜂蜜的延河 聖水」。果真如此嗎?且看作者的 敍述:

延河水在大生產運動開展之前,基本上是清澈的,枯水季節行人可以跋涉過河,但河灣低窪處有較大面積的積水,夏季漲水季節較平時水位高,水質泛黃,但都不影響延安古城居民的生活日用。1939年的機關生產運動,1941年底開始的全延安、勞動競賽,延安周圍山地幾乎被全部墾翻一遍,本來就不甚豐厚的植物受到毀滅性破壞。延河水變的植物受到毀滅性破壞。延河水季節,光猛肆虐,猙獰狂暴。(頁326)

不用多作評析,有了這些細節,真 實的歷史就呈現出來了。

在《延安》中,朱鴻召使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識考古學方法,即通過挖掘知識的深層來探尋被現存歷史埋沒的珍貴歷史線索。為甚麼要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延安?朱鴻召曾經有過一個說明:

我之所以選擇「知識考古」的方式, 是覺得延安時期的歷史分量太重 了。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它都 是巨大的歷史存在,深刻地影響了 一個民族幾代人的思想意識、價值 準則和生活方式。對此,任何戲 說、獵奇、以訛傳訛都是淺薄無 知,不負責任的表現。(朱鴻召: 〈有過天堂般歲月的延安〉,《時代 信報》,2007年9月10日,第16版。) 當然,朱鴻召並不是用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來研究延安的第一人。在朱 鴻召之前,袁盛勇曾經用此方法來 研究延安文學。

對於延安研究而言,知識考古 學的方法應該説是目前最為可取、 也最為有效的方法。以前的延安研 究本就因資料的缺乏而教人感到撲 朔迷離,再加上既有研究受意識形 態的影響而有意或無意地遮蔽,使 歷史真相更加模糊不清。在這種情 況下,知識考古學方法的運用便顯 得尤為重要和迫切了。當然,在目 前的情況下,用這種方法來研究延 安可能還存在不少困難,比如部分 重要檔案還沒有公開(如黨內的一 些重大決策文件、搶救運動、審幹 等方面的檔案資料);延安革命老 人在世的已不多,而且將會愈來愈 少。不過令人欣慰的是,隨着學術 環境的逐漸寬鬆,相當一部分的檔 案資料已經向公眾開放,這無疑極 大地促進延安研究的發展。

《延安》不僅具有相當學術價值,而且非常好讀。當然,說好讀並不是說把嚴肅的歷史學著作搞成「小說家言」,而是要求文字生動活潑、具有一定的張力。當下的很多歷史學著作,通篇都是一些玄而又玄的理論和晦澀難懂的語言,好像不惟此不能顯示其高深。朱鴻召的《延安》可讀性甚高。雖然書中有很多枯燥繁雜的史料,比如〈延安生活指數〉中的人口數字、物價變動和貨幣變遷的史料,但他將這些史料串聯起來,用文學性的手法呈現出來。

此外,作者的語言是生動而 富有張力的,比如在〈黑色的七月 十五日〉中,作者寫道:「人生有的 記憶是為了不忘記,有的記憶卻是 朱鴻召使用了福柯的 知識考古學方法,通 過挖掘知識的深層來 探尋被現存歷史線索來現 的珍貴歷史線索來前 究延安。這是具為有效 的方法。 **146** 讀書: 評論與思考

「延安日常生活」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延安》顯然是無法完全涵蓋的,、延安》顯然是無法完全涵蓋的,、民活會……還有很多,民很多東西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為了忘記。主觀意志上為了忘記, 恰恰是客觀上不能忘記,生活中揮 之不去。於是,人們改變記憶的顏 色,用憎惡的顏色來表達仇恨的心 理和厭棄的情緒,藉以維持人間道 義,呵護善良美好的意願。」(頁 185)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史料的 豐富再加上語言的生動,就使得本 書既有歷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學的 美感。當然,朱鴻召能做到這一 點,與他的專業背景很有關係,他 是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的文學博士, 有着較為深厚的文字根底。

當然,《延安》也不是沒有缺憾的。書中有些論述過於簡單,只是 蜻蜓點水。例如,〈工人有甚麼才來 勁〉一文附論的第三點,作者僅僅 指出「組織開展群眾運動的方式, 將工人改造成為生產模範、勞動英雄和政治標兵的單面人,將所有的社會資源都收攏在政治的掌握中,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後果。」(頁56)到底有甚麼樣的消極後果?沒有下文,作者的論述就戛然而止了。

另外,「延安日常生活」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課題,《延安》顯然是無法完全涵蓋的,延安的話語、節日、民主生活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已為學者提出,但卻沒有得到應有關注的「延安語言」問題。應該說,「文革語言」是典型的「後延安語言」,是「延安語言」的延續和極端發展。

筆者期望朱鴻召以及其他學者 在延安日常生活的研究方面能取得 進一步的成就。

楊慶堃的(宗教)社會學研究

● 黃劍波



楊慶堃著,范麗珠等譯:《中國 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 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中國宗教研究的聖經」,是歐大年 (Daniel Overmyer) 對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以下簡稱《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引用只註頁碼)一書的高度